

本文摘录自《复兴记》（作者：茅氏）第1.2章。

预览《复兴记》全本 及其各种版本 可去

<https://play.google.com/store/search?q=revival%20china%20mao%20min&c=books>

或 <https://payhip.com/fuxingjimaomin>

或 <http://fuxingjimaomin.wix.com/fuxingjimaomin>

## 第 1.2 章 袁世凯时期

### 宋教仁遇刺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帝制之后，中国开始走向共和，即实行议会制。于是，各种政党纷纷成立。同盟会的势力本来就很大，此时在宋教仁的积极活动下，更联合 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四个较小的政党，合组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对此，孙中山、黄兴共同署名发表声明，表示赞同。1912年8月25日，中国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孙中山以高票当选为国民党的理事之一，接着又被各理事推选为理事长。不久，孙中山表示：本人为了能集中精力于铁路建设，将国民党理事长一职 委托宋教仁代理。1913年初，全国各省正式的参议院、众议院两院议员陆续选出。国民党在参议院中成为第一大党，在870个席位中占有392席，多于袁世凯支持的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的总和。这样，国民党代理党魁宋教仁 将成为责任内阁的总理。宋教仁走访全国，四处演讲，抨击时政。袁世凯派人送给宋教仁一本支票本，说他可以自由签发支票，绝不退票。但宋教仁拒绝接受。袁世凯对他的亲信杨度说：“以暴动手段夺取政权尚易对付，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置总统于无权无用之地，却厉害得多了。”袁世凯担心自己将被架空。



宋教仁。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自上海动身，搭火车去北京。他在上海火车站入口的检票处，在伸手去取回检票员剪过的车票时，突然一声枪响，只见宋教仁用手摸着腰部，大叫道：“我中枪了，有刺客。”说时迟、那时快，只看到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子，在人群中不顾一切地逃窜而去。给宋教仁送行的黄兴、于右任等人，让汽车司机以最快速度，送宋教仁去铁路医院。路上，宋教仁伸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他胸口处，喘息着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奉托：（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的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医师用钳子从宋教仁的小腹中取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午夜2时，五位外科医生再次给宋教仁开刀，把他的肠子进行洗涤、缝补。宋教仁在病榻上托黄兴代拟一电，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经过。22日凌晨，宋教仁眼睛上翻。延至早晨4时，已不能言语，只以黯淡的眼神环顾四周，似乎依依不舍。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人，都围侍在病榻旁。黄兴在宋教仁耳旁大声地说：“钝初（注：宋教仁的字），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宋教仁眼中泛起了泪花，慢慢地断了气，时年33岁。黄兴、于右任伏尸恸哭。陈其美捶胸瞪足，说：“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陈其美请来照相馆的人，给宋教仁遗体拍了两张照：一张衣冠整齐，另一张赤身把伤痕照出来。

消息传到北京，国民党总部的人因失去了这位实际上的领导人，既哀伤又激愤。袁世凯得到秘书报告时，刚午睡起来，对秘书说：“有这等事吗？快拿电报来。”秘书捧出一束电报来。袁世凯显出十分惋惜的样子，说：“这怎么好呢？国民党失去了宋钝初，少了一个明白事理的首脑，以后越难讲话了。”他让秘书草拟优恤命令，处理宋教仁的后事。

在上海，有个人来到租界的中央捕房。来人名叫王阿发，是一位买卖古董字画的商人。他说：“十天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兜卖古董。因为他是我的老主顾，平素很熟。他这天拿了一张照片叫我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许以事成之后给我一千元作报酬。我因为只懂得作买

卖，从没杀过人，因此不肯承担这件事。当时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去暗杀的人，我相信如果找到了应桂馨，便可找到凶手。”3月1日，租界巡捕捉到了应桂馨，当时他在一个名叫胡翡云的妓女家里。第二天，巡捕搜查应桂馨的住宅，在宅内捉到了一个名叫武士英的男子，同时搜出五响手枪一支、密电本一本、函电多件。搜到的函电包括：

（一）国务总理赵秉钧致应桂馨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民国二年（注：即1913年）一月十四日”附密码一本，上面注明“国务院应密”。

（二）应桂馨给赵秉钧的电报：“民党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三）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2月1日致应桂馨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

（四）洪述祖2月2日致应桂馨函：“弟须于事前迳电老赵（注：指国务总理赵秉钧）索一数目。”

（五）洪述祖2月4日致应桂馨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注：这是洪述祖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颇喜，说弟（注：指应桂馨）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六）洪述祖2月22日致应桂馨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注：这是指赵秉钧）已将密本交来，统归兄（注：这是洪述祖自称）一人经理。”

（七）3月13日洪述祖致应桂馨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八）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报：“梁山匪魁（注：指宋教仁）四出扰乱（注：指宋在各大城市演说指责袁世凯），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

（九）3月21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报：“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从这些函电中看，主使刺杀宋教仁者应是总统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担任联络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的是应桂馨（注：上海黑帮头目）。直接行凶的是武士英（注：失业兵痞）。不久后，赵秉钧向袁世凯提交辞呈。袁世凯批示：“准予请假暂时休息。”4月初，赵秉钧对北京《新纪元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我和钝初（注：宋教仁的字），一任内务，一任农林，以同僚而为至友，他住西直门外

农事试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来不及出城，他总住到我家中，我们感情甚洽，无话不谈。他离北京南下时，欠了五千余元的债，都是我替他偿还的。”他的意思是：我不可能参与刺杀宋教仁。

当时孙中山身在日本，得知宋教仁被刺身亡后，于3月25日回到上海。当天晚上，他与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会集在黄兴寓所，商讨应对宋案的策略。各人意见颇为分歧：黄兴主张按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戴季陶“欲以暗杀袁世凯，省事免牺牲”；孙中山认为暗杀不足取，对法律解决也不以为然，他主张起兵反袁，说：“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黄兴不赞成孙中山的意见，他认为：我们国民党打不过袁世凯的北洋派；革命阵营中许多人只想做官，已经投向北洋派了；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仅有江西、湖南、安徽、广东四省，而这四省的内部也并不统一，因此国民党必需量力而行；在国际方面，黄兴认为中华民国还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边疆形势也日益险恶，如果国内再发生战事，中国可能成为朝鲜第二（注：朝鲜这时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孙、黄争论不决，遂分电广东的胡汉民、湖南的谭延闿征求意见。但收到的复电，都表示不赞成马上起兵，理由是备战不足。4月中旬，革命党人在上海再次秘密开会。多数人仍同意黄兴的意见，孙中山先生只好同意从缓发动对袁战事。会议最后决定：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出面，建议袁世凯：成立一个特别法庭，推黄郛为主裁，全权处理宋案。会后，程德全向袁世凯提出建议。袁世凯表面上表示接受，但暗地里却让司法总长许世英出面以不合编制为借口反对成立这个法庭。最后，特别法庭的事不了了之。

4月16日，上海的租界捕房将宋案凶手应桂馨、武士英移交给上海地方检察厅。24日，武士英在狱中暴毙。应桂馨在狱中却过得很舒适：他有鸦片烟瘾，开始时他把吗啡浆涂在手帕上用鼻子闻闻过瘾，后来更要求抽鸦片烟，并获得法院特准。7月25日，应桂馨被一群人成功劫狱，逃到青岛，躲了起来。10月，他从青岛来到北京，写信要求袁世凯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给他“勋二位”并现金五十万元。袁世凯派人暗中赏他一笔钱让他离开北京。但应桂馨坚持他所提出的两个条

件，少一条都不成。有人提醒他说：“老袁不是好惹的，你莫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他却指着自己的鼻子 狂傲地说：“我应桂馨是什么人？他敢拿我怎样。”1914年1月的一个晚上，四条大汉 以搜查烟土为名 进入应桂馨的住处。刚巧应桂馨这晚不住在这儿，四个大汉搜了房后离去。经此一搜，应桂馨第二天便离开了北京。就在他所乘坐的京津铁路头等客车里，他被军政执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侦探王双喜 杀死。【注：这两名侦探，也都没有得到善终。当军政执法处的处长陆建章 就命督陕时，袁世凯命郝占一 也一起赴陕；到陕西后不久，陆建章就借故杀了郝占一。王双喜听到郝占一 已被杀，惊悸万分，在北京他住的旅馆中 发了疯，一会儿说 他看见宋教仁向他怒目而视，一会儿又说 他看见应桂馨血淋淋的面孔。他不久便死了。】

宋案另一罪犯洪述祖，一直避居青岛。几年过后，大家对宋案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他自己也认为没有问题了，就化名张皎安，回到上海。后因债务纠纷，被一个德国商人 扭送到租界巡捕房。当他偿清了债务，从捕房里跑出来 刚要上汽车时，被年仅15岁的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刘白（宋教仁的秘书）死死扭住，并被扭送到上海法院。后来转解到北京，被判无期徒刑。他上诉，反被改判为绞刑。一般说来，绞刑死者是全尸；但他受刑时，他的头却被切了下来。

赵秉钧 因宋案辞去总理一职后，不久调任直隶都督。他得知 应桂馨在火车中被杀后，打长途电话给袁世凯：“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袁世凯听后，答应缉凶。但不到一个月，赵秉钧就在天津督署 七窍流血而亡，时年51岁。赵秉钧死后，袁世凯对人表示“非常悼惜”，并送了一幅祭幛，亲自写了“愴怀良佐”四个字。

## 孙中山的第二次革命

1913年5月13日，由国民党籍的 陕西都督张凤翔、山西都督阎锡山 两人领衔，与北洋系的都督 冯国璋（直隶，即河北）、张锡奎（奉，即东北三省）、周自齐（鲁，即山东）、张镇芳（豫，即河南），以及甘肃护理都督 张炳华一起，联名发表通电，指责“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注：均为国民党籍）不惜名誉，不爱国，谗说朋兴，甘为戎首……倘有不逞之徒，敢以谣言发难端，以奸谋破大局者，则当戮力同

心，布告天下，愿与国民共弃之。”15日，袁世凯下令：取消黄兴陆军上将的资格。

当时，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朱瑞等人出来调停“南北之争”。袁世凯对调停人说：“并非南北有意见，乃地方不服中央，中央当然惩治，无调停之可言。……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

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力主武力反袁。袁世凯调北洋军的第6师去江西，与李烈钧的赣军对峙。他又通过黎元洪要求李烈钧“洁身引退，举贤自代”，但被李烈钧拒绝。袁世凯随即派人策反多名赣军将领，并得成功。李烈钧见此，决定暂不行动。

当时，上海会党首领张尧卿、徐企文、柳人环等人准备在制造局发动反袁起义。他们假冒黄兴、陈其美的名义组织队伍。5月28日晚，陈其美得悉张尧卿等准备动手的消息后，即用电话通知了制造局督理陈榘。次日凌晨1时，徐企文率领一百多人，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进攻制造局，当即遭到有准备的阻击，徐企文被诱捕，起事者随即一哄而散。袁世凯命令将徐企文押赴北京审讯，以图指实起义为黄兴、陈其美所发动。但徐企文始终说是他们自己假冒了黄兴、陈其美的名义。柳人环带了十多人逃往江西，希望能依傍反袁最坚决的李烈钧。但他于6月3日抵达南昌至都督府求见李烈钧时，遭到拒绝。李烈钧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问是否要拘捕柳人环。程德全复电说：“张光曦、柳人环假克强（注：克强是黄兴的字）名在外招摇，克强迭有函电来请拿办。近来臆度造谣者多，必将张、柳拿获，以表白克强之心迹。”5日，李烈钧派军警逮捕柳人环、文仲达、卢汉生等十三人。（注：后来，李烈钧下野后，柳人环被解赴北京。不久，他与徐企文同日被处决。）

6月2日，国民党著名人士汪精卫、蔡元培从欧洲回到上海，准备与袁世凯谈判。他们拟定的谈判方案是：国民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

宋教仁案 罪名到洪述祖为止；袁世凯制止渲染 嫁祸于国民党的徐企文案，停止票传黄兴。正当他们与赵凤昌、张謇磋商，让他们接触袁世凯之时，袁世凯罢免了李烈钧的江西都督一职。不久，袁世凯又撤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改任西藏宣抚使，另任命陈炯明为广东都督。胡汉民、陈炯明之间的矛盾甚深，经汪精卫调解后，他们三人联名密电黄兴，表示一致讨袁，请黄兴主持长江军事。赣、粤两督的罢免，使孙中山的武力讨袁主张 在国民党内逐渐占了上风。黄兴为大势所逼，开始着手规划 倒袁的实际军事部署。他把行动的方向 定在湖北。正当湖北国民党人准备起兵之际，上海制造局事件中被俘的文仲达 供出革命党在汉口的机关 设在《民国日报》馆。湖北都督黎元洪得报，即令军警会同法租界巡捕 查封《民国日报》馆，逮捕了报馆四名编辑，并搜获文电、布告多件。在武汉负责起义全局的詹大悲，看到机关被破，命令起义部队立即集中南湖 发起暴动。但是，由于各处的下属机关 也已被破坏，多名联络、指挥人员已被捕，暴动没有发动起来。接着，詹大悲再次鲁莽行动，派人到处纵火。驻扎天门、潜江一带的章裕昆一个营，虽如期举行起义，但旋即因孤立无援而溃散了。詹大悲等人在武汉立脚不住，在日本人掩护下，乘日轮岳阳丸 逃往长江下游。经这次失败，湖北国民党人被摧残殆尽。

6月底，孙中山由香港来到上海。这时候，国民党籍的一些带兵将领 仍希望保存实力，不想武力反袁。在南京的第8师，是国民党掌握的一支精锐部队，但该师师长、旅长们，借口中下级军官不能一致，不同意出兵讨袁。孙中山对此非常气愤。他在上海召集会议 力促陈其美在上海独立、章梓在南京倡议，又派朱卓文 前往南京 运动第8师的营、连长起兵。但是，最后没人按他的指示发动起义。于是，孙中山、黄兴又宴请当时在上海的李烈钧，动员他回江西 起兵发难。李烈钧说：“各省如能响应，赣事尚可为。”孙中山告诉他南京即将起事，李烈钧心动了。会后，正巧江西第1旅旅长林虎 派团长李思广 来见李烈钧，告诉他 江西军队斗志高昂。李烈钧终于决心 首先发难。

7月初，李烈钧从上海 抵达九江的湖口县。9日晚，李烈钧致电 江西护卫军司令欧阳武、江西各机关，说：“鄙人免官赴沪养痾，忽闻北军入赣，愤不欲生，现已回赣効力。”不料，欧阳武 严词回绝：“此间皆不主战，请君速速返沪。否则，武即会同北军夹攻湖口。”他派三名代表

赴湖口 劝李烈钧离境。 李烈钧虽然遭到江西护卫军的拒绝，但得到江西陆军第1师第1旅旅长林虎等将领的支持。11日，李烈钧委任林虎为讨袁军左翼司令，指挥三个团 攻击沙河一线的北军；任命方声涛为右翼司令，率三个团 攻击在九江的北军；任命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12日拂晓，林虎部前卫 在左翼发起猛攻。同时，李烈钧在湖口 发布讨袁檄文，并向人民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袁世凯；二、巩固共和政体；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财产。”13日，李烈钧 就任讨袁军总司令。

孙中山让原临时大总统府 庶务司 司长朱卓文 去南京，任务是：“运动第8师的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长、旅长后宣布独立。”朱卓文到南京后，该师的两名旅长，王孝缜、黄恺元，在下层军官的压力下 最后表示愿意起兵讨袁，但有个条件：请黄兴赴南京 就任讨袁军总司令，而请孙大炮（注：孙中山的外号，“大炮”在广东话中的意思是“说大话的人”）千万不要在此混乱时期来南京。 听了这个条件，孙中山十分气愤，准备亲身前往南京，“亲统六师”，“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他到黄兴寓所相谈，黄兴说：先生“不善戎伍，措置稍乖，遗祸匪浅。”黄兴表示 自己愿意代孙中山 前往南京指挥。孙中山勉强同意了。14日夜，黄兴由上海抵达南京，到第8师师长陈之骥的住宅，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作战计划。第二天早晨，第8师官兵进入江苏都督府，都督程德全 从睡梦中惊醒。黄兴率高级将领 入府会见程德全，说明讨袁大义，请程德全协助。多病的程德全，对此突然事变 一时啜嚅难言。第8师师长陈之骥等高级将领，纷纷跪泣哀求。程德全虚与委婉，附和独立、讨袁，随即请 随黄兴来宁的章士钊 起草讨袁通电，以程德全、应德闳、黄兴三人的名义，宣布江苏独立，并以程德全的名义 委任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几天之后，程德全 离南京赴上海。到上海后，他立即通电声明：“本月15日，驻宁第8师等各军官要求宣布独立，德全苦支两日，旧病剧发，刻难撑拄，本日来沪调治。”

在安徽，驻扎在芜湖的陆军第1师第2旅的旅长龚振鹏 是国民党籍，他带了少量军队 前往合肥，运动其旧部 起兵反袁。接着，有国民党人从上海来到芜湖，策动驻芜湖的一个营长程芝萱 反袁、独立。龚振鹏 随即从合肥 去电响应。程芝萱营 遂以龚振鹏的名义宣布：芜湖独立、讨袁。驻宣城的张永正团，来到芜湖汇合，一起反袁。在安庆，袁世凯任



命的代理都督孙多森等人，也于7月17日宣布安庆独立。这样，安徽大多城市实现了讨袁、独立。

在上海，曾任南京临时政府 参谋本部代参谋总长的钮永建，在松江临时组织了一个团的兵力。陈其美组织了一支主要由军校学生组成的“奋勇军”，宣布成立上海讨袁军，被黄兴委任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然而，驻沪领事团却向南、北两军宣称：“（一）无论南北，如欲在沪开战者，须离租界三十英里；（二）须各存金镑一千万镑，预备偿还各项损失。否则即以违背万国公法论，实行干涉。”上海总商会 也致函南、北两军说：“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争持之必要。无论何方面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乱党。”这一切，使力量本来就很微弱的上海讨袁军 迟迟不敢用兵，而希望通过谈判 让进驻制造局的北军 和平退出。

在广东，陈炯明 于7月18日 在省议会宣布广东独立，并通电讨袁；他让第1师、第2师、独立旅等部队各编组一个支队，出师援赣。但是，各师、旅长互相推诿，迟迟不肯发兵，致使江西前线苦战无援。

在福建，第14师师长许崇智等国民党人 组成讨袁同盟会，积极筹划起义。他们要求都督孙道仁 宣布独立。孙道仁 遂于7月20日宣布“与袁氏断绝关系，自修政治，力策进行……俟大局粗定，仍归统一。”他又声称保守疆土最为重要，拒绝了许崇智等人提出的 出师讨袁的要求。

在湖南，蒋翊武等国民党人 向湖南都督谭延闿 进言，要求宣布反袁独立。谭延闿虚与应付，却偷偷派人到湖北 对民国副总统黎元洪说：“已准备药水，如湘称独立，即服毒自尽，以谢天下。”黎元洪劝谭延闿道：“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救平。”于是，谭延闿只是敷衍主张讨袁的革命党人，竭力推迟宣布讨袁的时间。直至7月25日，谭延闿才宣布 与袁世凯脱离关系。 与他相反，国民党人程潜 编组了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宣布讨袁。但他们严重缺乏武器、弹药，战力十分有限。

在四川，反袁的事更为复杂。川督原是尹昌衡，国民党籍，因平叛西征而远出川西理塘，川督遂由胡景伊代理。后来，袁世凯任命胡景伊为四

川都督，尹昌衡改任川边经略使。四川的国民党人，为了反胡景伊，赴雅安谒见尹昌衡，邀他返省、复政、讨袁。7月3日，尹昌衡回到成都，胡景伊被迫避居昭觉寺。但尹昌衡却又不肯复政、反袁。在袁世凯的严令催促下，他于月底重返川西。于是，胡景伊便放手镇压革命党人，并准备编遣由国民党人掌握的驻重庆的第6师。该师师长熊克武遂宣布四川独立。

虽然很多省份都有些军队声称反袁，但全国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孙中山只是发表了一个宣言：“愿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庶可以挽国危而慰民望。”并致电袁世凯，进“最后之忠告”，劝他辞职。

但是，掌握雄厚兵力的袁世凯却迅速调兵遣将，很快将各地的反袁军打了下去。8月18日，北洋军李纯部攻克南昌。28日，北洋军倪嗣冲率兵进驻安庆。9月1日，张勋的“武卫前军”攻克南京。11日，熊克武放弃重庆独立，解散部队，化名逃亡；次日，滇军入重庆。至此，各省纷纷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相继逃往日本。历时三个月的反袁斗争，宣告失败。这次反袁斗争，史称“二次革命”，即第二次革命（注：第一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反清；这次是第二次，反袁）。

## 中华革命党

一年多以前还是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如今成了通缉犯，流亡在国外。他在东京痛定思痛，认为失败的原因“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在他看来，要不是黄兴等那么多人坚持法律解决宋教仁被刺案以至延误反袁战机的话，断然不会有二次革命之败。讨袁斗争之初，黄兴又以“（孙）文不善戎伍”为由，使孙中山不能“亲统六师，观兵建康”；而当战事失利时，黄兴更弃守南京，致使“三军无主，卒以失败”。孙中山对黄兴说：“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凡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从国民党的创建史看，同盟会是由孙中山创建的兴中会、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等组织合并而成；而宋教仁一手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现在，孙中山决心成立一个新党，“中华革命党”。他规定，原国民党党员若想加入中华革命党，就必须重新宣誓，其誓言为：“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同时必须在宣誓书上加印右手中指的指模。在中华革命党的党章中，孙中山把党员分为三等：凡在第三次起义（注：即“十次起义”中的黄冈起义）爆发前入党的，为“首义党员”，他们将在革命政府建立后成为“元勋公民”，享有参政的优先权；凡在第三次起义爆发后、将来的革命政府成立前入党的，为“协助党员”、“有功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凡在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的，为“普通党员”、“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至于非党员的其他人民，则在训政时期不享有公民权利。

孙中山的这些规定，遭到黄兴等一批国民党元老的抵制。其实，章太炎、陶成章等人此前曾两次发起倒孙风潮，其目的就是以黄兴代替孙文；但当时黄兴极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使两次风潮都没有成功。黄兴虽有这个雅量，但要他发誓、按手模向某一个人效忠，却是他所无法接受的。他说：对个人的宣誓服从、加按指模，“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将党员分为三等的做法，则是“不惜以权利相号召，效袁氏之所为”，与民主原则背道而驰，因而“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他又说：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敌强我弱，而在党员违命。其他同盟会元老，如李烈钧、柏文蔚、程潜、谭人凤、熊克武等人，都希望能保全“堂堂正正”的国民党。但孙中山坚持“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时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导师……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大部分国民党人认为：孙中山有理想、有理论，常年在海外奔走筹款，在华侨中威望无人可比；黄兴则耕耘国内、领导起义，在军中是众望所归；没有孙、黄联手，也就不会有国民党的事业。在军队中，更有很多人说：“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

孙、黄只得分手了。但黄兴不愿影响孙中山的事业，决定远走美国。1914年6月底，黄兴与孙中山话别后，登船赴美。7月8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孙中山宣誓就职，党员宣誓服从孙中山、并按指模。孙中山在总理之下特设“协理”一职，虚位以待黄兴。但是，黄兴直至去世也没有入党，而协理的位置也就一直空着。【附注：黄兴在袁世凯死后于1916年7月回到上海。10月10日，因胃出血入住医院，其间多次大量吐血，肝脏肿大，诊断为肝硬化后期。10月31日，因肝门静脉高压致食道、胃部的静脉屈张破裂出血在上海去世，年仅42岁。孙中山亲自主持其治丧活动。】

孙中山这次在日本期间，与宋庆龄结了婚。宋庆龄是1913年8月底从美国抵达日本横滨的，当时她刚从美国的卫斯理安女子学院文学系毕业。她到达时，她的姐姐宋霭龄担任着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来后，两姐妹就一起协助孙中山。此前，宋霭龄曾向孙中山暗示爱慕之情，但孙中山一点反应都没有（注：她长得很是一般）。宋庆龄来后，孙中山却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年轻、高雅的姑娘。宋霭龄看在眼里，最后于1914年9月离开孙中山回上海，后来与孔祥熙结了婚。宋霭龄离开后的一天，情窦初开的宋庆龄凝视着孙中山说：“记得我小时候（注：当时孙中山常去她家，她的父亲宋嘉树是孙中山的好友，曾多次捐款资助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听你讲过：‘要是我不为了一件伟大的事业而生存，那么我的生命便毫无意义。’现在我要知道的只有一件事：你要不要我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见宋庆龄直言相问，孙中山先是自己年龄大了，虚与推诿；但很快就对宋庆龄说：“能与你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亦不后悔。”宋庆龄为了取得她父母对这桩婚事的同意，特地返回上海去见父母。但是，父亲听后，立即破口大骂孙中山：“我捐款给你搞革命，你却在那里搞女人，而且是搞我的女儿！”母亲则劝导女儿说：孙已有妻室，你们两人年纪相差悬殊，他儿子比你年龄还大。但是，宋庆龄意志坚决。父亲让一个女仆看住宋庆龄，不让她离开半步。可是那位女仆同情宋庆龄，趁买菜的机会秘密帮宋庆龄寄出了一封给孙中山的信。孙中山接信，得知宋庆龄被软禁，立即派朱卓文到上海来营救宋庆龄。朱卓文到上海后，秘密与宋庆龄取得了联系。一天，宋庆龄给父母留了一张字条后，打开卧室（在二楼）窗户，以床单为索，滑下楼去，坐上朱卓文事先准备好的车子，直奔码头，乘船到达东京。在宋庆龄回上海期间，孙中山派人把发妻卢慕贞接到日本，

商谈离婚之事；最后卢慕贞带着离婚协议书回到澳门，在那里有一套孙中山为她准备的住房。她离开日本的第二天，宋庆龄到达日本横滨。次日，49岁的孙中山与22岁的宋庆龄，在日本律师和田瑞的家里举行了婚礼，签订了婚姻誓约书。婚礼上，孙中山送给新娘一把手枪，说：“手枪配了20颗子弹，19颗给敌人准备，最后一颗危急时留给自己……”宋庆龄终身珍藏着这把手枪。



孙中山、宋庆龄的结婚照。

孙中山除了与卢慕贞、宋庆龄结过婚外，还曾与一位名叫大月薰的日本女子生过一个女儿。孙中山第一次见到大月薰时，她才11岁。当时，她随父母寄住于孙中山在横滨的寓所的二楼。一日，水从二楼流到一楼孙中山的房里；为此，孙中山让他的翻译温炳臣上楼去看看。原来是大

月薰不慎打碎花瓶。她父亲让她下楼，去向孙中山道歉。孙中山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嫩芽似的少女，常有来往。她长到14岁时，孙中山通过温炳臣向她父亲提亲。她父亲以女儿太过年幼而拒绝。后来，她父亲又答应可以先订婚。第二年两人订婚，次年成婚，当时大月薰16岁。大月薰生一女，取名富美子。在女儿出生前，孙中山已因事离开日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看过大月薰母女俩。大月薰在多年联系不上孙中山之后，另与他人结婚。

## 日本对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从日本返回中国后，约见袁世凯，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中方对此保密。2月2日，中国外交部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置益开始秘密的进一步会谈。中方代表多次拒绝日本要求中的部份内容（如军事顾问一款），对此日本作出了一点点让步。日本政府为了向袁世凯施加压力，向中国东北增派了三万军队。虽然会谈极度机密，但不久即有外国报纸将“二十一条”内容公布于众。

日本提出的要求共有二十一款（即二十一条），分为五号（即五部分）：

“第一号，关于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共四款：1. 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力利益让与等项处分，中国政府概行承认。2. 凡山东省内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以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3. 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4. 中国政府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

“第二号，关于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共七款：1. 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2. 日本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营造商工业应用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须要土地之租借权和所有权。3. 日本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意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各项生意。4. 中国政府允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臣民。5. 中国政府如准许他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建造铁路或以该地区课税作抵押他国借款时，应先经日本政府同意而后办理。6. 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

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商议。7. 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限。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注：该公司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三部分组成，是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共二款：1. 俟将来机会相当，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2. 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关于切实保全中国领土，共一款：1.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一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共七款：1.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注：该条袁世凯未直接同意，但在段祺瑞执政时获得同意）。2. 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3. 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内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全面筹画改良中国警察机关。4. 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日中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5. 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铁路之建筑权，许与日本国。6. 福建省内筹办铁路、开矿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时，先向日本协商。7. 允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二十一条被披露见报之后，全中国举国哗然。各界人士纷纷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质问，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行动。上海首先发起“储金救国运动”，工人、店员、学生、人力车夫、乞丐都捐出微薄所得，以供对日开战之用。当时流亡海外的黄兴等人，力主暂停反袁活动，一致对外。但是，孙中山没有明确反对二十一条；相反。他继续秘密与日本要人联络，争取日本对他革命事业的支持。【附注：1915年底，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他在声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的同时又说：“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违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

权。”1917年9月15日，孙中山在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中，说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1918年11月16日，孙中山在与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谈话时说：“目前中国南北对立是日本助长起来的，日本如果改变援助北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会不攻自灭。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现存一份由孙文签署的文件，题为《中日盟约》，其中包括：“……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第三条、若中华海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要用日本军人；第四条、使中国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第六条、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其他外国。”】

1915年1月至4月期间，袁世凯政府一方面同日本谈判，一方面逐步将二十一条的内容向报界泄露，以期获得世界列强的注意。当美、英、法三国驻日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质询时，日本外务省只承认有第一、二两号中的十一条。后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思类承认了第三、四号的存在，而后在美方追问下，加藤高明又承认了第五号的存在，但说这只是日本的“希望”而非要求。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同意删除第五号。

5月7日，日本政府突然对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于9日下午6时以前必须接受删除第五号后的修改案，否则“帝国政府将执行必要之手段”。8日中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找中国外交部长陆征祥谈话时说：“中国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我到中国40年，和大总统有30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赶过来说几句真挚的话。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此时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中国政府除接受日本条件外，别无自全之道。”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劝告中国政府“应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9日夜11时，袁世凯政府宣布接受二十一条中第一至第四号的要求。

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怒。北京二十万人到中央公园集会，成立“救国基金”，以募集捐款一百万元为目标。天津南开学校学生，其中有周恩来等人，上街演讲，号召人们振兴经济、誓雪国耻。全国各省教育会联



合会决定：全国各级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称为“五九国耻”。湖南长沙学界发起成立了“国耻会”。在成立会上，湖南甲种农业学校学生彭文超，当场切断自己的手指，写下血书：“立志不愿看到国破家亡。”会后，他写了五份遗书，分别致老师、同学、家人等。他在遗书中写道：“平生立志不为亡国民……坐视以待国亡，不如舍生以报国恨。”5月24日傍晚，即中日代表正式签字的前一天，彭文超怀抱石块投湘江自尽而亡。第二天，长沙市民在湘春门外的湘江岸边打捞出尸体。湖南省教育会随之为彭文超举行追悼会，来吊唁者上万人。人们在彭文超投江自沉处设立“彭君文超抱石自沉处碑”。

5月25日，中日双方正式签字。然后，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他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二十一条中的第一至四号之后，不久又与日本签订了《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等条约，对二十一条中已答应的条款作了更具体的规定。

### 阻止外蒙古独立

1912年2月15日，主张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哲布尊丹巴王公，在沙皇俄国的策动下，乘中国清廷被推翻之机在库伦宣布成立“大蒙古国”，自封“大蒙古国”皇帝。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个月后，即1912年4月22日，发布大总统令，宣告：“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该各地方，同为中

华民国领土，则蒙、藏或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将来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内政。”他致电哲布尊丹巴说：“前清以统治权让于民国，民国人民已经总揽政务权，举付与本大总统。承前清之旧地域内有外蒙古一部分，本大总统受全国托付之重理应接管。至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电文希望哲布尊丹巴“悔悟”、“勿再听信他人唆使”，同时警告说：“现各省将领，以领土损失，治权亏缺，愤慨甚烈，各思纠集健儿，以与贵喇嘛相见。”与此同时，袁世凯命令热河、张家口、山西、绥远等地的驻军，坚决反击外蒙古叛军对内蒙古的侵犯，并在1912年底将外蒙古的叛军驱逐出了内蒙古，内蒙古的形势很快稳定下来。袁世凯又委派在北京的蒙古王公联合会会长那彦图为交涉代表，前往库伦。8月，民国政府公布《蒙古待遇条例》，条例规定：“嗣后各蒙古均不以藩篱待遇，应与内地一律。各王公原有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蒙古王公俸饷从优支給。”对于脱离“大蒙古国”分裂政权返回中国的外蒙高级官员，袁世凯均给予优待。他接见了返回中国的库伦政府原陆军部侍郎那贝勒，给予慰勉，并晋封他为郡王。袁世凯任大总统期间加封的蒙古王公，比清朝几百年加封的王公还要多。袁世凯的这一招，使库伦等地的不少蒙古大臣陆续返回。

12月3日，沙俄与“大蒙古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和《俄蒙协约专条》，以支持外蒙古自治换取了沙俄在外蒙排他性的商业地位，而对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则只字未提。《俄蒙协约》的签订，激起中国国内舆论哗然。外交总长梁如治辞职。继任外长陆征祥，与沙俄驻华公使库朋斯齐于1913年5月20日议定《解决蒙事条文六款》，其中承认俄方的商务利益。该议案被中华民国的参议院否决。9月18日，中国继任外长孙宝琦与库朋斯齐再度谈判，达成《中俄声明文件》，承认中国对外蒙古有“宗主权”，指明“大蒙古国”库伦政权取消独立、取消帝号、取消年号等。1914年9月8日起，中、俄、外蒙三方在恰克图举行会议。赴会谈判的前夕，袁世凯面谕全权专使毕桂芳、陈蒙，要求将外蒙古库伦政权取消独立作为开议的先决条件。据此，中方代表为此与蒙方、俄方激烈交锋。中国专使态度坚决，拒不妥协。最终，经3个月谈判斗争，沙俄、外蒙分裂分子不得不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外蒙古废除国号、年号、帝号以及政府名义，哲布尊丹巴图克图汗接受中

华民国大总统册封。1915年6月7日，外蒙古正式宣布取消独立，恢复为中国领土范围内的自治地方。

## 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在击败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后，于1913年11月4日以叛乱罪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这样，国会人数不足、无法运作，只得休会。袁世凯另行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取代国会。次年1月10日，袁世凯解散国会。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议会。5月，袁世凯根据《中华民国约法》成立参政院，行使立法职能。袁世凯又下令撤销国务院，而以在总统府内新设立的政事堂代替，其首脑称国务卿，并备副手两名，分别称左丞、右丞。袁世凯又将文官官阶分为九秩，即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袁世凯的复古色彩愈来愈浓。他采取“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的方针，规定只有在前清做过州、县官吏的人，才有资格做各省的民政长。

袁世凯对清王室仍然感恩戴德。早在刚当选大总统之时，他就致书“大清皇帝陛下”，表示感戴清王室的恩德。他多次表示：自己的元首地位，是清王室禅让而来的，自己要感恩戴德。后来隆裕皇太后病故时，袁世凯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三天，文武百官服丧二十七天，并派国务委员荫昌前往皇极殿灵堂代祭，送三万元礼金。在服丧期间，他一直臂戴黑纱。在平时，袁世凯对前清的遗老遗少一直礼敬如宾。有些前清的遗老遗少，希望袁世凯会念及前清恩泽，恢复大清王朝。

1915年，报章上常有文章宣扬君主制，说“共和政体不适宜于中国”、“中国只宜君主制”。其中，有两个人显得很是特出。一位是社会名流杨度。他发表了一本著作，题为《君主救国论》，认为只有君主制才能救中国。文章写成后，他托人转呈袁世凯。袁世凯阅后，大加赞赏，并秘令手下将领段芝贵加紧印刷该书，广为送发。杨度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将袁克定比作当代的唐太宗李世民（注：李世民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儿子），将自己比作谋臣房玄龄、杜如晦。杨度联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成立了“筹安会”，取“筹一国之治安”之意。他们说这是一个学术团体，“研究君主、民主国

体，二者何者适于中国”。杨度自任理事长。另一个活跃人士，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校长弗兰克·古德诺。1915年，当他又一次来到中国时，袁世凯派农商总长周自齐拜会他，说总统要他准备一份文件，论述“民主与君主政体哪一种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古德诺很快完成了一篇论文，题目为《共和与君主论》，发表在8月3日的《亚细亚日报》（注：这是一份在中国出版发行的英文报纸）上。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人民民智低下，不具备参与政治的品质，在这种情形下，实行共和制是没有益处的；比较而言，还是君主制更符合中国人民的历史习惯。不久，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日本东京的报章也予以转载。这位美国大学校长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的私交也很好。

社会上更出现了稀奇古怪的流言。说袁氏祖坟的坟丁进京来报：在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墓旁，长出一支紫藤，长逾丈许，蜿蜒盘绕，状似龙形。袁世凯、他的妻妾、子女听了，兴奋异常。袁世凯厚赏了坟丁，并且嘱他不要对外人谈及。袁世凯然后特派长子袁克定回乡观察。袁克定到老家河南项城后，来信报告说：“是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袁世凯大喜，回信让袁克定筑墙护卫，以防牛羊践踏。又一流言说：袁世凯收到一位自称天文学家的人的上书，曰：“由某日起，三更以后，有帝星朗照某某纬度，正在河南项城县地区，兹已逐次北来，月后可至京师，上天垂象，当属在吾皇也。”袁世凯看后，将信将疑。当夜，他携长子袁克定登上殿月台，果然看到如是星象。袁世凯大喜。再有一流言说：一天，袁世凯的茶童照例端着杯盏侍立在正在午睡的袁世凯的床侧，因为袁世凯午睡醒来，定要饮一口香茶。这个茶杯是用上等碧玉雕刻而成，是朝鲜国王当年赐给袁世凯的，袁世凯十分喜爱它。其时，袁世凯还未醒来，打着鼾。茶童捧着香茶，呆呆地看着大总统，越看越眼花：床上睡的哪里是大总统，竟是一只大蟾蜍。这茶童被吓，手中的茶杯掉到地上，顿时粉碎。幸好熟睡中的袁世凯没有被惊醒。茶童自知闯了祸，心里没了主意，就跑去找侍奉领班，请教该如何办才好。领班听罢，沉吟片刻，给茶童出了一个点子。茶童心里有了底，回到袁世凯的卧室。袁世凯一觉醒来，没有喝上香茶，又看见心爱的茶杯已经粉碎，不由得脸一沉，问茶童怎么回事。茶童怯生生地说：“小人不敢说。”袁世凯问：“怎么不敢？”“小子怕大总统怪罪。”“你说吧！”“刚才我看见床上睡的

不是大总统。”“胡说，不是我是谁？”“是…是…是一条五爪大金龙，遍体金鳞，闪闪发光……”袁世凯听罢，一屁股坐下，没再言语，顺手从桌上拿起一件值钱的玩意儿，递给茶童，沉着脸说：“这事不要对别人讲。”这样一类的传说，在民间广为传播。大家都知道：袁世凯想做皇帝了。

8月24日下午，北平军警特别会议召开。会上，段芝贵、袁乃宽、雷震春、江朝宗等军界、警界要人纷纷发言拥护君主制。同时，梁士诒、朱启铃、周自齐等一批京官，发动成立了“公民请愿团”，拥护君主制。此后，在北京先后成立了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匠社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团体，拥护君主制。各省纷纷仿效。见此，梁士诒发起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然后，这个联合会，由梁士诒、杨度等领头，三次向参议院呈递请愿书，要求实行君主制。在此期间，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均代表本国政府表态：赞同袁世凯称帝。9月中，全国各地敦请袁世凯下令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10月，各省选出的代表陆续到京，开始举行国体投票。12月11日上午，参议院汇查各省投票，结果各省代表合在一起共有1993人，而且他们全部赞成君主立宪，一票也不少。参政院秘书长林长民，随即宣读早已准备好了的推戴书。代表以起立的方式表决推戴书；结果全体起立，一致通过，没有一个人没站起来。袁世凯接到参政院的推戴书后，拒绝参议院推戴，说：“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于是，参议院复会，讨论通过了第二次推戴书，称颂袁世凯“功越百王、德亘万古”，再次呈递袁世凯。12月12日晨，袁世凯发表文告，宣布接受推戴，下令改国号为“中华帝国”、1916年为“洪宪元年”。19日，下令设立“登极大典筹备处”。23日，袁世凯特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共计128人；封孔子第76代孙孔令贻仍袭“衍圣公”，加郡王称号；派皇族溥伦为参政院院长。

到这个时候，奉命参加国体投票的各省代表的使命已完，遂由孙毓筠主持遣散，每人发路费100块大洋，远省则发200块大洋。代表们哪里肯依：说这是想用100块大洋把他们打发了事。他们尾随孙毓筠到孙家，狂呼乱骂，继以砸毁家什。孙毓筠打电话给警察、宪兵。这些代表

说：“警察？别说警察，天兵天将来也得加钱！”孙毓筠无奈，给每位代表再加 200 元，事情才算了结。

1915 年 12 月 11 日，袁世凯登基为中华帝国皇帝。这立即遭到孙中山、梁启超等人的坚决反对，连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表示不满。有一个叫蔡锷的将军，原是云南都督，后被袁世凯调来北京，任陆军部编译处 副总裁。来京后，他装出一副胸无大志、酒色之徒的模样，上青楼，下酒馆，吃喝玩乐，与名妓小凤仙的关系 尤其似胶如漆。1915 年底，他在小凤仙的掩护下，逃离北京，经天津、日本，回到云南昆明。12 月 23 日，蔡锷向袁世凯发出电报，要求立即无条件取消帝制，并严惩杨度、孙毓筠、严复等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限令 24 小时内答复。袁世凯没有理他。25 日，蔡锷通电全国各省，宣布组织“护法军”，讨伐袁世凯。袁世凯找到蔡锷的老上司李经羲、熊希龄，要求他们从中调解。调停失败后，袁世凯派曹锟率领军队，攻击蔡锷的护法军。但蔡锷率领的护法军 越战越勇，影响扩展至贵州，威逼川、湘。袁世凯遂增派军队前往四川、湖南。此时，袁世凯倚重的大将陆荣廷 也反叛他，宣布广西独立于袁世凯。



袁世凯和他统治时期发行的银币：  
左面的俗称“袁大头”，右面的俗称“飞龙”。

1916 年元宵节那天，袁世凯的九个姨太太 为了“妃”、“嫔”的名分，当着袁世凯的面 再次大吵起来。袁世凯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

不要再闹了！你们都要回彰德去，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过了几天，袁家的一个丫头买回一大包五香酥蚕豆，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的。袁世凯的一个女儿袁静雪，注意到这张《顺天时报》上满是声讨袁世凯称帝的新闻，和袁家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完全相反。她把这同一天的两份《顺天时报》一对照，才知道《顺天时报》原来有两个版本。当晚，她把那份反对帝制的《顺天时报》拿给袁世凯看。袁世凯看了之后，便问是从哪里弄来的？她照实说了。袁世凯眉头紧皱，但没有说一句话。第二天清晨，他把长子袁克定叫来，问他是怎么回事？袁克定只得承认这是自己捣的鬼，并跪在地上求饶。袁世凯用皮鞭子抽打他，一边打，一边骂他“欺父误国”。袁克定不惜搞诡计以促成帝制的原因是他想做太子。袁世凯有十七个儿子，其中袁克定是长子，而且是唯一的嫡出。袁世凯一直着意培养他，使他不仅旧学功底深厚，而且德语、英语都相当不错，袁世凯与洋人交涉时，经常由袁克定充当翻译。

不久，袁世凯收到了冯国璋、李纯、靳云鹏等人敦促他取消帝制的通电。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现在担任着要职的重要人物。接着，徐世昌这位袁世凯的密友，也来信敦促他取消帝制。这时，英、美、日、德、意等国也表示反对袁世凯称帝了。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于1916年3月21日在新华宫召集会议。会议气氛阴沉沉的，谁也没有好办法来解决当前难题。袁世凯淡淡地说了一句：“都是我不好，不能归咎于别人。”接着说：“取消帝制。”这时，只有倪嗣冲做出一副怒目金刚的样子，表示：谁胆敢反对帝制，“臣誓死扫荡而后快”。袁世凯马上制止了他。第二天，袁世凯发布文告，宣布取消帝制，仍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并恢复黎元洪的副总统职位。至此，帝制结束，前后共维持了102天。

袁世凯身体出现了问题。开始时，只是小便不畅。但袁世凯不肯看西医。后来，在儿子袁克定的坚持下，才让法国医生贝希叶来家诊治。贝希叶发现袁世凯得的病是膀胱结石，现在已有尿毒症的症状，他建议袁世凯到医院去动手术，但被袁世凯拒绝。这样，贝希叶只好在袁世凯卧室里给他导尿，但此时导出来的已是血尿，可能肾脏也已出了问题。袁世凯自知不起，让人把徐世昌、段祺瑞找来。他把总统大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注：副总统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好

了，也准备回彰德去。”5月6日凌晨，袁世凯身亡，终年57岁，归葬于河南故乡。

袁世凯一生共有一妻九妾，与她们生了三十二个儿女。他的元配妻子于氏，是河南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她生了长子袁克定之后，袁世凯就不再与她同房，只把她当作主妇看待。袁世凯每隔三天、五天的，就去她房中坐一会儿，随便聊上几句家常话。清廷封她为一品诰命夫人。有一年元旦，各国公使暨夫人到总统府贺年。有位公使偕夫人来到于氏面前，公使出于礼貌要与她握手。见此，于氏大为惊慌，立刻把身子一偏，将双手缩回背后去。这位公使先是僵在那里，然后只好同夫人退了下去。此后，于氏出场时，袁世凯总让他的两个女儿陪同她，在旁代为答问。大姨太沈氏，原是上海的一名妓女，苏州籍。袁世凯二十二岁时，在上海谋事无成，逛窑子解闷，点了沈氏。一来二去，沈氏主动资助他去猎取功名。她备酒送袁世凯离沪时，对袁世凯说：他走后，她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袁世凯努力功名，不负旧情。袁世凯备受感动，随即指天为誓，与她挥泪而别。后来，袁世凯出人头地、站稳脚跟以后，果然将沈氏接去，做了他的姨太太。二、三、四姨太都是朝鲜人。袁世凯任清廷驻朝鲜商务代表时，朝鲜王府将李王妃的表亲金氏嫁给袁世凯为妾。金氏出嫁时，带来两个陪嫁的丫头：闵氏、吴氏。袁世凯见了这三位如花似玉的美女，就将她们都享用了。更让金氏生气的是：袁世凯按她们三人的年龄大小，排定吴氏（17岁）为二姨太，金氏（16岁）为三姨太，闵氏（16岁，小生日）为四姨太，即她的两个丫头不但与她并列，有一个还排在她的前面，所以终生郁郁寡欢。袁世凯很喜欢这三个朝鲜姑娘，让她们轮着侍寝，结果她们给他生了一大堆儿女：吴氏生了六个，金氏五个，闵氏四个；在袁世凯三十二个儿女中差不多占了一半。五姨太杨氏，出身于天津一个小户人家。她心灵口巧、遇事有决断，袁世凯让她管理整个袁府的家务，各房的佣人、丫头，袁世凯的众多儿女，都得服从她的约束，成了袁府的王熙凤。对后来进门的六、七、八、九四房姨太太，她管得更严。六姨太太叶氏，本是南京的妓女。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去妓院玩了之后被她的胴体迷住，说要娶她。回京后，他向父亲复命时，他一磕头，不料叶氏的照片就从口袋中滑了出来，掉在地上，袁世凯喝问这是什么。袁克文说：是在南京给父亲物色的一个漂亮姑娘，带回来这张照片，看父亲是否喜欢？袁世凯接过照片一看，果然美艳，就派人去南



京将叶氏接了回来，收为第六房姨太太。七姨太太张氏，河南人，袁世凯喜欢她，就把她收了房。八姨太太郭氏，原是苏州妓女，是有人拍马屁从苏州买来敬献的。九姨太太刘氏，原是五姨太的小丫头，含苞待放，袁世凯此时已五十多岁了，特别喜欢小姑娘，有一天就收了她，此后疼得不得了。五姨太表面不说什么，心里却发醋，曾借故把她打破了头。九个姨太太，当然是一个比一个年轻。袁世凯实际上召宿的，总是最年轻的那几个。但不管那夜谁值宿，早晨起来给他穿衣、伺候一切的，却都是五姨太。